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潘维 玛雅 主编

# 聚焦当代中国 价值观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聚焦当代中国 价值观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 / 潘维, 玛雅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12

ISBN 978-7-108-03057-3

I. 中… II. ①潘…②玛… III. 价值(哲学)—演变—研究—中国 IV. 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5265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 序 言

潘 维

## 一

在 2007 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盘点价值观变迁三十年的大型研讨会。来自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五十多位学者和四十多位国内媒体代表参与了本次研讨会。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是根据现场录音编辑而成，细致地记录了学者们在会上的唇枪舌剑，分歧与共识同在，严肃与调侃共存，颇具可读性。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5 年秋季。除日常研究项目外，研究中心每年就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主办一届大型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和海外华裔学人共襄盛举。第一届年会于 2006 年 2 月 18~19 日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举行，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主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议论文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很有分量，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在 2006 年出版。第二届年会于 2007 年 8 月 25~26 日在北京友谊饭店举行，主题是“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除这本会议实录外，与会代表的会议论文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本研究中心的第三届年会将于今年（2008）底举行，主题是“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与中国模式”。

## 二

盘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体上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

类视角。在精神文明的范畴里，价值观变迁显然是个核心话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下半期，价值观的“混乱”或者“混战”是我国人文社科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社会关系出现了巨大变化，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出现了巨大变化，“今是而昨非”以及“昨是而今非”的价值观变迁俯拾皆是。其实，与1919~1949年和1949~1979年的两个三十年相比，在以往三十年里，我国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变化还算平缓，没有出现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经由三个巨变的三十年，我国的社会关系跳跃着走向了“现代”，我国的价值观也跳跃着走向了“现代”。比较三个三十年的价值观变迁，大约比物质成就更能清晰地勾画出我国社会变迁的轨迹。可以预见，社会价值观不会凝固在以往的三十年里；未来的三十年，我国可能经历更宏大的社会价值观变迁。

价值观是关于社会关系是非曲直的判断。依照如此定义，价值观与社会关系就直接相关，价值观的变迁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也就直接相关。换言之，社会关系的变化构成价值观变化的主要动力。生产结构变化，社会关系也随之变化，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乡村熟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军人社会以及城市的工商业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不以血缘为纽带，价值观当然不同。

多元的社会关系和多元的价值观使我国社会拥有强大的活力。绝大部分价值观的变化只会使一部分人“不适应”，不会引发社会分裂和社会动荡。职业不同，价值观就不同；但既然人们相互依存，一般就会相互妥协。社会变化快，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就快，就造成同一时代里不同年龄人之间的价值观“代沟”；解决之道依然是相互尊重和妥协。

然而，在最近这三十年的后半期，我国的社会关系开始呈现紧张状态。社会关系中不仅出现了利益的多元化，而且出现了利益的激烈博弈，开始撕裂我们的社会。在国内，我们看到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在国外，我们看到“国际社会”这个富国俱乐部暴露出控制和贪婪的欲望，而且丧失了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光环。迫于世界体系，人均收入还不足三千美元的我国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并频遭

投资歧视和巨额投资损失。我们忽然发现，“开放”是褒义词，但“买办”是贬义词；“停滞”是贬义词，但“稳定”是褒义词。由此，我国社会价值观不仅多元化了，而且还出现了明显的对抗。

基本社会关系的稳定及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能维持社会团结，阻止社会分裂。尽管追求以强国富民为目标的“现代化”依然是我国人民的基本共识，但没有社会团结就不可能有强国富民。于是，在经历了最近三十年的变迁之后，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开始自下而上地兴起。

中国式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有三个：(1) 要求重新评估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将三千年与最近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既然传统政治文明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方式的结晶，就不能用一个西方的负面概念“专制”来简单地概括和否定。(2) 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前三十年的传统貌似与“改革”相左，却为中华由小农文明跨入工业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3) 要求重新评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将其不仅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而且与新中国的挫折连在一起。西方文明趋于极端，不仅激励进步，也带来掠夺和异化；不仅应当学习，而且还可以批评。

仅仅将这种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斥为“极端民族主义”是无益的，这思潮的崛起有国内和国际的思想基础。

在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始出现，批判精神再度兴盛。在城市，批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需求的依赖和对国内需求的轻视。在乡村，批评以“海选”和“费改税”为名的改革摧毁基层政权，使政府在乡村沦为空中楼阁，把权力真空留给一些黑社会 and 外来宗教势力去填补。当传统的工农联盟丧失了基层政权这条纽带，农民的利益与国内和国际资本求扩张的利益就经常呈对抗性质。因此，“发展”必须以“和谐”为前提，追求“社会和谐”开始崛起为一股官民共有的强劲思想潮流。

在这最近的三十年，市场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价值观与国内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联系日益显得含糊不清，反而与全球生产体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相关，与世界体系内的霸权话

语系统密切相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一批激进学人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哈耶克，一切弊端归于现存的党政制度，急不可耐地要求“改革闯关”，要求照美国政府的模样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变革。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反倒成了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1987~1989年间风靡我国知识界的理解是：没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读作竞争型选举），就没有经济市场化。历史证明，那时的流行理解大错特错，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选举化并无必然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认识到，完全的市场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而今仍有激进学人试图把西方政治学里的“合法性”观念套用于我国社会，继续论证社会关系多样化与奉行多党选举政治必然联系的“规律”，证明竞争型选举能减少腐败的“规律”，证明只有竞争型选举才有政府“合法性”的“规律”。但在逻辑和历史面前，这种“规律”业已阵脚大乱。最新的趋势是放弃论证“规律”，号召信仰和服从“普世价值”。信仰“普世价值”与当年信仰我国体制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毫无二致；有些支持者甚至还重复了类似当年“就是好，就是好”的“不言自明”。为什么这种似曾相识，被当年知识界严厉批评为“强词夺理”或者“蒙昧主义”的论证方式能回归？自冷战以来，核心价值观不断被抽象化、符号化，逐渐成为生存方式的图腾，阵营间对抗的利器，乃至民族兴衰的原因。换言之，符号化的核心价值观被从本国的基本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斗争的战场，成了撬动基本社会关系的杠杆。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也不是被陆海空军的武器打败的。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是被符号打败的，是在解构和建构核心价值观的混战中采取鸵鸟政策而失败。苏联输掉的是“冷战”，但损失的惨重程度却远远超过“热战”。于是，在思想战线上和世界体系中求生存、求独立自主，就构成了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际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还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标志，是自信地总结“中国模式”的起点。

### 三

有些社会关系是基本的。基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社会就不团结，就陷于分裂。我把基本的社会关系分成七个层类：(1) 个人与他人的关系；(2) 人与自然的关系；(3) 个人与群体的关系；(4) 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5) 人民与政府的关系；(6) 人民与国族（国家政治疆界内的所有公民，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的关系；(7) 国族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应这七层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我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分成七层：(1) 道德观；(2) 自然观；(3) 群体观；(4) 整体观；(5) 政治观；(6) 国族观；(7) 世界观。当代每个国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都是以道德观为核心构成的七层同心圆。

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在短期内通常不足以直接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核心价值观却是脆弱的。核心价值观因一些神话式的典型符号而在社会中流行，而现代的社会大众传媒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解构或制造出大众神话，导致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能够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使这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紊乱，甚至使超级大国出现玛雅文明那样的自杀行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人类的基本道德，正如《圣经》中的“十戒”所言，是禁止杀人、抢劫、偷窃、欺骗、遗弃、强奸。道德的存在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行为，也是人类社会普适的，见于中外各种古老的习惯法之中。“食色性也”，理性地追求物欲享受是人的动物本能；为此孔子曾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价值观不是本能，是人类进化出的观念，即“人性”。有了道德约束，人类就脱离了动物世界，高于动物世界。然而，一夕之间，我国冒出了对“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之类的绝对信仰，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和“理性”，开始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灵里的基本道德迷失了，社会就出现分裂堕落的危险。尽管我国在三十年里有此偏差，但最近的反弹是强有力的，国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爱心



惊天地、泣鬼神，证明我中华社会的道德基础依旧牢不可破。诡异的是，我国居然有大型媒体把这人道之“爱”的道德看作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我国至今还有待“启蒙”，有待与西方“接轨”，有待西方“普世价值”的光芒普照。这与断定墨子和孔子是康德的儿子一样荒唐。“泛爱”，只是在抽象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普世的。爱心主要与社会是否失序有关，也同道义文化的历史沉淀有关，还同自身生活圈的范围有关。生活圈的范围与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关，还受生活圈的界限约束。民族国家的疆界由重兵把守，是人类福利的主要界限，也就成为爱心的主要界限。创造“民族观”，组织“民族国家”，派军队去屠杀远方的人，占领远方的土地和抢夺他人的财富，制造旨在大规模杀伤平民的核武器，都与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脱不了干系，与近代和现代西方脱不了干系。人类的基本道德标准当然普适。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随意杀人、掠夺他人财产、欺骗、偷窃、强奸、遗弃老弱病残，都“违法”。然而，人间的种种不道德行为有其结构原因。正如业主与雇员的关系虽是社会的普遍关系，却主要不是，也不可能主要是“爱”的关系，其矛盾不可能靠鼓吹“泛爱”的道德来解决。显然，当今中国一些知识分子鼓吹普世价值，目的并不是针对道德层次的问题，而是针对政治层面的问题，尽管举的例子通常是道德层面的违法行为，无论在中国或者西方都属于违法。既然我们都属于人类，道德感当然放射于核心价值观的每个其他层次。但越往外层，道德感就越弱，道德说辞就往往越被滥用为攻击性武器。比如，为了攻击自己不赞成的政治体制，笔下就都是这个体制下侵犯“人权”的事，而不顾及自己支持的体制为什么会发生更恶劣的事，甚至极端到把大地震说成是佛诞日对体制的“天谴”，无视自己批判的体制下依然存在的大爱精神。

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与每个人乃至每个民族都息息相关，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归结为社会关系，人看待自然的观念也就成为社会观念之一。毋庸置疑，保护地球环境是工业时代的全球性任务，没有谁反对这种所谓“普世价值观”。自古以来没人从价值观上反对给子孙造福，反对修路架桥治水，那不是价值观问题，而是个公共财产问题，关键在谁出资，出多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科学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

观，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主体。然而，仍有不少人用宗教迷信来看待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用宗教迷信来处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迷信像寄生虫一样吸附在迷信者的头脑之中，使人精神空虚，任人摆布。如果我国的官员信奉迷信，原已绝迹的巫婆神汉、算命先生就重回街头，我们的社会就缺乏科学精神，就出现古人所称的“王道衰，妖道兴”。近代西方的进步与世俗化密切相关，我国的进步与无神论的推广有关。我们尊重宗教信仰者，但不等于我们赞成宗教，支持宗教迷信的扩张，把扶持四处建造神像当“文化”，以香火信众的鼎盛为“繁荣”，而不去支持科学信念的“普世”性。因此，就我国当代的情形而言，我国知识界是否需要明确“自然观”的价值取向？

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我们开始出现了比较重要的分歧。个人至上，家庭至上，集团群体至上，乃至国族至上，都在中西方的某段历史里有其流行的时代。就价值观而言，时空不同，侧重点就不同。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导致流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侧重点。群体危亡之际非要强调个人利益第一的“理性”和“自由”，就会被认为是“无耻”。视个人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单位，属于某类极端的“自由主义”。群体观并非只有个人本位一种。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由群体赋予的，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不可能体现在伤害群体之中，而必定存在于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之中。没有群体认同的个体，虽然自由了，却是社会垃圾。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社会中最自由的人，也是最不自由的人。我们可以承认上述群体观也“普世”吗？我们可以承认二十世纪以来从西方引进的集体主义精神有普世意义吗？既然有分歧，就需要妥协，就不能强调自己的信仰有绝对“普世”的性质。然而，就我国当代的情形而言，我国知识界是否需要明确“群体观”的价值取向？

在群体与整体的关系上，我们的分歧可能更重要。群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关系。村庄之间，企业之间，单位之间，都存在竞争关系。在以往三十年里，因为对计划经济的反弹，市场被理解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思路，迷信“市场规律”已经成为一种整体观。然而，群体间竞争的自由是应当受到限制的，受整体利益的限制。近代以来，我们的群体价值边界一直在扩展之中。小集体之上还有大集体，大集体之上还有社会整体，即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外还有地球上的全人类。由家族认同而村落认同，由村落认同而乡镇认同，由乡镇认同而县市认同，由县市认同而省份认同，而国族认同，这是靠不断扩展边界而进步的“现代”整体价值观。我们称这种现代观念为“公民”意识。因为是“公民”，所以不能伤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允许市场迷信，不能任由市场力量把我们的社会分化为贫富两极，引发阶级斗争。这也是欧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由来。因此，对市场机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以服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制性规范为前提。然而，就我国当代的情形而言，知识界是否需要明确这种整体观或曰“社会观”的价值取向？

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我国知识界出现了重大分歧。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是政治观。政治观与社会结构一道决定政治体制。倘若政治观与中国实际的社会结构不兼容，就会撬动和扭曲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就会导致制度的混乱，导致社会动荡。与西方的阶级集团结构不同，我国数千年家庭农耕历史造就了平等而且高度流动的社会结构，传统的政治观产生于其中，与之兼容。我国的主流观念是：政府官员“是英雄不问出身”，靠公平考试入门，靠绩效评估升调奖惩。中立地维护“百姓”福利，即社会整体的和谐安宁，就是绩效。天下太平是士子们修身齐家治国的最终目的。于是，上自《尚书》里记载夏朝之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解，下至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主张，数千年来，民本主义成为我国政治价值观的脊梁，万世一系。西方的政治观与西方对抗性的利益集团结构兼容，要求政府代表强大的利益集团。于是武力的强弱、血缘的远近、金钱的多寡、选票的数量先后或同时构成政府的“合法性”。在当代，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就多数决的逻辑而言还是诡计多端的现实政治而言，选票本身所导致的“合法性”都相当脆弱。为什么要强推与自己社会结构不相匹配的政治理念？为什么要把中国中立的“绩效政治”变为利益集团争夺政权的“选票政治”？如果说我们的制度经常未能“择优”，那么选票制就能？任期规定和分权制衡常常被吹嘘为多数决选票制下才可能有的安排。可事实是，绩效选拔制内同样能规定任期，同样能安排分权制衡。真正的问题是，多数决的选票制符合西方分裂社会的传统，

符合西方人民的政治观，却会在中国导致社会分裂，违背中国百姓要求政府“公正廉明”的政治观。政治观可以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可以被精英们信奉宣扬而流行，从而撬动国体。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治观出现了严重分歧，也证明了政治观的非普世性。那么，就我国当代的情形而言，知识界是否需要凝聚出我国“政治观”的主流价值取向？

在人民与国族的关系上，我国知识界的价值观呈现的不是分歧，而是内战。个别大型媒体一方面力捧国内的族裔隔离意识，贬低国族的意义，斥责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又鼓吹认同西方的“国际社会”俱乐部，与那“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口号同声唱和。在近代西方造就的“国族之林”中，连超级大国都感到不安全，何况方方面面依旧落后的我国。中华民族战胜了多少苦难才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团结。忘记了历史的国族没有未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不能不高歌国族家园的认同，不能不团结一心。缺少了国族认同，像苏联或者南斯拉夫那样被分裂肢解乃是早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争议根本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观”问题，而是一场国族观的保卫战。美国以强力维持“美国认同”，西方的欧洲在打造“欧洲认同”，中东人在打造“阿拉伯认同”，拉美人在打造“拉美认同”，这是“全球化”的必然。谁的自我认同被全球霸权持有者给“化”掉，谁就崩溃。

在国族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上，由 13 亿人组成的中华民族如何看待世界体系，如何看待当今由西方 7 亿人组成的占有霸权地位的“国际社会”？毋庸讳言，我国新闻界和知识界的看法五花八门，并无统一性可言。其实，尽管“西方社会”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看法也不大统一，但终究有个“主流”的看法，即西方社会代表世界的进步和未来，其所作所为代表“自由、民主、人权”，所以必须保持对世界的主导权。不服从西方国家俱乐部，就是“国际社会”聚众打压的对象。为什么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一的“西方”能“主导”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其他人民？西方社会拥有相对统一的“世界观”，比较团结；其他社会在思想上是分散软弱的，行为上也必然分散软弱。权力是支配他人的能力，由思想、财富、暴力、人格四大要素构成。使用财富和暴力支配他人的能力与规则制定权连在一

起，与思想统治连在一起，与话语霸权连在一起。在武力不复能决定胜负的核武器时代，在思想被大众媒体左右的时代，正如虚拟的经济决定实体经济，虚拟世界的话语霸权决定物质世界的霸权。所以，我国知识界的世界观之争不是什么“普世价值”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内战”，而是一场关于支配与被支配的持久的国际混战。在这场混战之中，我国知识界的看法能否凝聚出一股坚强的主流，形成自己独特的国际视野，将决定我国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强弱。

概括起来说，核心价值观体系好似一个以道德观为核心的七层同心圆。核心价值观体系由内而外道德性、普适性、牢固性都逐层下降；由外而内道德性、普适性、牢固性则逐层上升。就道德性、普适性、牢固性而言，政治观是关键的拐点层，世界观是最脆弱的外层，起类似多米诺骨牌第一张那样的作用。如同大清王朝、苏联、南斯拉夫，核心价值观体系都是由外而内逐层被攻破的。1975年是苏联自信心很强的年代，那年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的国际观妥协。自那之后，苏联的知识精英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就开始分裂，十五年后苏联就崩溃了。在苏联崩溃之际，我们曾经见证了那时的社会道德有多么堕落，并不亚于萨达姆垮台后的伊拉克。

因为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组织了关于价值观变迁的大型研讨会，并按照上述层次进行了分场讨论。无论讨论的水平高低，却是记录了与会者们对问题的理解，也记录了我们的分歧。

当您浏览这本书时，希望您不仅读到沉重和严肃，还能读到会议的轻松和愉悦，读到李少君在会上朗诵的浪漫诗歌，看到赵汀阳幽默辛辣的会上即席漫画。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我国主办奥运的喜庆时节，收笔之际也是闭幕式开始之时，胜利的焰火在全北京城升腾，一扫这2008年笼罩华夏的阴霾。中国在北京奥运会收获了包括51块金牌在内的100块奖牌。奥运史上单届赛会只有苏联曾经获得过比中国更多的金牌，那辉煌纪录是苏联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创造的。那一年，史称中国运动员“兵败汉城”。再一年，戈尔巴乔夫成了不少中国知识精英们眼里的英雄，再两年苏联就彻底崩溃了，败在苏联知识精英们的手里，败在他们早已混乱不堪的社会价值观之中。

# 目 录

|                                     |     |    |
|-------------------------------------|-----|----|
| 序言 .....                            | 潘 维 | 1  |
| 构建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                   | 吴志攀 | 1  |
| 第一场 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多元化 .....            |     | 3  |
| 潘 维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新的核心价值观共识 .....        |     | 3  |
| 孙伟平 人类在什么时候都存在价值共识 .....            |     | 8  |
| 石秀印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             |     | 13 |
| 陈新汉 怎样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信 .....        |     | 19 |
| 杨松林 当今中国社会价值观的错位与迷信 .....           |     | 23 |
| 汪 晖 社会核心价值观重构的内外挑战 .....            |     | 27 |
| 开放发言与评论（一） .....                    |     | 34 |
| 第二场 开放发言与评论（二）：我国社会价值观目前存在的问题 ..... |     | 44 |
| 第三场 三十年来我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演变 .....           |     | 70 |
| 沈明明 北京市民政治社会价值观实证研究报告 .....         |     | 70 |
| 周孝正 中国的价值观出了大问题 .....               |     | 85 |
| 辛志勇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价值取向变迁及现状 .....         |     | 89 |
| 申端锋 中国乡村社会的伦理性危机 .....              |     | 95 |

|                                 |     |
|---------------------------------|-----|
| 张利华  建构中国特色的新型核心价值体系 .....      | 100 |
| 开放发言与评论（三） .....                | 102 |
| 第四场  三十年来的政治价值观 .....           | 112 |
| 房  宁  当代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演变 .....     | 112 |
| 张  光  中国公民眼中的政府 .....           | 117 |
| 胡伟星  中国的软实力与国际价值体系 .....        | 127 |
| 王正绪  东亚儒家社会的现代与后现代价值观 .....     | 132 |
| 杨  明  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实证研究报告 .....      | 142 |
| 张曙光  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对外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   | 148 |
| 开放发言与评论（四） .....                | 150 |
| 第五场  三十年来的文化价值观 .....           | 162 |
| 赵剑英  当代中国三大价值观的交汇与整合 .....      | 162 |
| 赵汀阳  说出来的价值观和做出来的价值观 .....      | 167 |
| 张  静  中国人认为财富怎样分配是公正的 .....     | 171 |
| 翟学伟  中国社会在进步中什么被取代了 .....       | 176 |
| 河  清  中国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新教文化 .....     | 180 |
| 董正华  建构核心价值观当以史为鉴 .....         | 184 |
| 开放发言与评论（五） .....                | 187 |
| 第六场  三十年来的社会价值观 .....           | 192 |
| 王绍光  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支撑面 ..... | 192 |
| 童世骏  当代中国价值领域存在问题的背景分析 .....    | 207 |
| 史天健  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实证研究报告 .....      | 212 |
| 曹锦清  中国人安慰心灵的价值不是来自西方 .....     | 219 |
| 任剑涛  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的疏离与回归 .....       | 222 |
| 白智立  我们进入一个价值观重构的阶段 .....       | 227 |
| 开放发言与评论（六） .....                | 230 |

|            |                         |     |
|------------|-------------------------|-----|
| <b>第七场</b> | <b>三十年来我国传播领域的价值观表现</b> | 236 |
| 熊 蕾        | 美国的心理战和中美媒体之间的差异        | 236 |
| 程鹤麟        | 中国电视从政治挂帅到市场挂帅          | 242 |
| 黄纪芬        | 戏剧的公共性和中国革命的价值观         | 243 |
| 吴冠平        | 三十年来中国电影与国家的关系          | 246 |
| 李少君        | 当代中国需要“借诗还魂”            | 251 |
| 祝东力        | 我们不能只有经济的规划，更需要文化的想象    | 257 |
|            | 开放发言与评论（七）              | 260 |
| <b>第八场</b> | <b>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b>        | 269 |
| 周建明        | 西方核心价值的生成以及对中国的参考意义     | 270 |
| 韦正翔        |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 274 |
| 武 力        | 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价值观变迁     | 278 |
| 韩毓海        | 中国革命的遗产与当前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 283 |
| 邵善波        | 价值观转型是和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 293 |
|            | 开放发言与评论（八）              | 295 |



# 构建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吴志攀<sup>〔1〕</sup>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我们看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些重要的执政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正在进行着重大创新，并且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触及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空前的，与之相应的，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也很明显。我们拥有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但同时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要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化解社会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强调，要凝聚社会共识，构建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为重要内涵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重要的执政理念的提出，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西

---

〔1〕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